抗战中的宁波记忆
“四明丹心”特展开幕

▲抗日战争时期铐过李敏的手铐。

◀朱镜我使用过的派克钢笔。

展厅入口。

抗币。

雕塑《送别》。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宁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所在地，曾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客居他乡的“宁波帮”人士也曾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实业救国抵制日货，倾力救助受难同胞，坚守民族气节，在多个层面贡献重要力量。

9月1日，由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宁波博物院、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服务中心主办的“四明丹心——抗日战争中的宁波记忆”特展在宁波帮博物馆开幕。

展览紧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与中国共产党宁波地方组织成立100周年重要节点，通过珍贵实物与史料，系统展现宁波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历程，既是对抗战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对英雄先烈崇高精神的致敬。

1 100件(组)珍贵实物展现抗战历史

据策展人何毓峰介绍，特展分主题篇“三江潮涌——中国共产党领导宁波人民抗日的光辉历程”和专题篇“四海同心——‘宁波帮’人士参与抗日救国的感人事迹”两个部分，依托100件(组)珍贵实物，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宁波的抗战历程，展现宁波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坚定信念、无畏勇气与坚韧毅力。

走进展厅，四明山体浮雕映入眼帘，与四明山实景油画背景结合，表现“四明丹心”主题。

在“三江潮涌”展区，展览以时间为轴进行叙事。从抗日战争爆发和宁波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到宁波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再到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直至1945年宁波地区抗战胜利，每个阶段都通过展品与图文资料进行了还原。

朱镜我使用过的派克钢笔、铐过李敏的手铐、浙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拾圆抗币等实物，格外引人瞩目。钢笔虽有磨损，却藏着热血初心；锈迹斑斑的手铐凝结着不屈的气节；拾圆抗币印刻着根据地的抗战印记——它们都是鲜活的历史“见证者”。

展区还利用阶梯空间，在立体墙面上镌刻了130多位宁波籍烈士的姓名。

“这面高墙犹如一座纪念碑，我们希望营造一个让观众在此仰望烈士、致敬烈士的场景。”本次展览的形式设计倪磊介绍说。

墙面下方以层峦叠嶂的四明山脉为背景，展示多位烈士的绝笔；一旁的多媒体设备同步播放着工作人员重新诵读的烈士遗言，声声在耳，令人动容。

拐角处，一尊名为《送别》的雕像静静矗立：小女孩紧握战士的手不愿放开，母亲深深凝望着战士。三人仿佛都明白，此番离别，或许再无重逢之日。“当年，很多牺牲的战士都非常年轻，他们是儿子，也是父亲，但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毅然挥别家人，奔赴战场。”倪磊动情地说。

2 一批“宁波帮”人士为抗日做出贡献

专题篇“四海同心”展区聚焦“宁波帮”人士的抗日贡献，通过“抵制日货，实业救国”“担当责任，救助难民”和“舍生忘死，坚贞不屈”三个维度，讲述他们的感人事迹。

展柜中陈列的方液仙创办的国货公司包装纸、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商标等，见证其“实业救国”的努力；竺梅先“国际灾童教养院”手绘全景图、黄延芳救助难民记录，体现其责任担当；项松茂遇害后五洲大药房推出的“一三一”牙膏广告(项松茂于1932年1月31日，为营救被捕店员而被日寇杀害)、陈万运拒与日方合作史料，彰显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展品串联起“宁波帮”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抗战记忆，深刻诠释了其精神中的爱国内核。

开幕式上，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讲解员乐欣瑜深情宣讲了朱凡烈士的英勇事迹，宁波博物院讲解员张维娜生动讲述了竺梅先夫妇救助难民的感人故事。

宁波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览不仅是对宁波抗战历史的系统回顾，更通过文物背后的故事，彰显了宁波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与英雄气概。希望这次展览，能让更多人铭记抗战英烈的热血丹心，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本次展览位于宁波帮博物馆B区二层临展厅，将持续至12月14日。为配合特展，宁波博物院还将推出多场以“宁波人与抗战”为主题的主题讲座、话剧演出等活动。同名展览同时在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临展厅展出。

■新闻多一点

烽火岁月中的“宁波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救国活动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次展览让大众注意到，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作为“上海最强的中国经济力量”，一批旅沪宁波籍商人义无反顾地参与抗日救国，展现出“宁波帮”一贯以来重视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

“化工大王”方液仙，是中国化工业的先驱之一，在上海开设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又联合吴鼎昌等人创办了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抗战时期，敌伪欲利用方液仙在上海商界的影响，许以“高职”，方液仙一口回绝。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被汪伪特务绑架，不屈而死，年仅47岁。

中国近代民族造纸业先驱竺梅先，在“一·二八”事变后，多次募集资金、创办医院，救护伤兵、救助难民。1938年，竺梅先、徐锦华夫妇筹款5万元，在今奉化莼湖镇的泰清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接收流浪孤儿600余人，免费提供食宿和教育。

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中国呢绒第一人”陈贤本凭借其上海市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主席身份，在公共租界冒险主办收容所，为难民提供吃住；实业家黄延芳在“七七事变”后，筹款开办多处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40多万人，后又于1939年组建国际难民救济会。

中国新药业先驱、五洲企业集团总经理项松茂，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登报声明“不进日货”，并在厂内组建抗日义勇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打响，五洲大药房日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1932年1月31日，项松茂为营救被捕店员而被日寇杀害。

蓄须明志的秦润卿，宁愿放弃厂房、也誓不与敌合作的三友实业社创始人之一陈万运，自嘲“宁为茶萝(穷光蛋)，不当汉奸”的“钟表大王”孙梅堂等人，也都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朱晨雨 何毓峰